



《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4月15日出版

代序：

拉美智库的一些“故事”和中国智库的一点“解读”*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 一、全球智库分布与拉美智库数据：现状与概况
- 二、拉美智库起源：类型与排名
- 三、拉美智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与贡献
- 四、美国智库的巨大影响力：对拉美政策和对本土政策
- 五、拉美智库国际网络的形成：左右轮回与多元共存
- 六、智库作为产业链的影响力：新自由主义盛行拉美的另类解读
- 七、中国智库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三个定位”
- 八、拉美所 50 年：继往开来，迎接挑战

一、全球智库分布与拉美智库数据：现状与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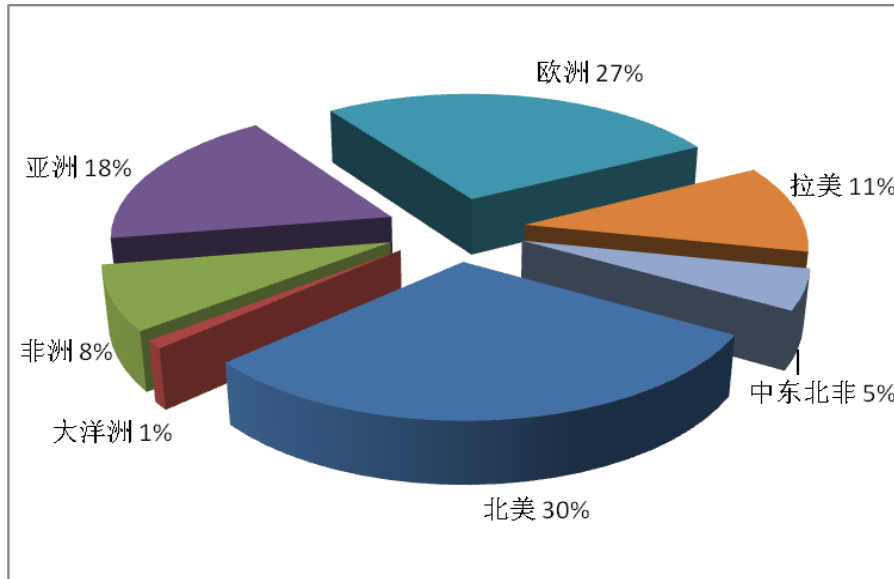
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计划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出版一本全球智库年度报告。在 2010 年全球思想库的排名遴选过程中，全球来自 169 个国家的 6480 个智库作为候选者参加了此次评选，有 1500 多名学者、决策者、记者、区域研究专家和项目研究专家组成评审组，经过复杂的多个程序，历时数月，评选出了 2010 年度全球智库排行榜。

据这刚刚出炉的《2010 年全球思想库排名》，在全球智库分布中，北美有 1913 个，占全球的近三分之一；其次是欧洲，达 1757 个，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强；再次是亚洲，1200 个，占全球的 18%；拉美位居第四，有智库 690 个，占 11%；非洲有 548 个，占全球的 8%；

* 本文初稿征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苏振兴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白乙研究员和所长助理吴国平研究员的意见，他们做了很好的评论，匡正了一些西文译名。拉美所的房连泉博士和齐传钧博士通读了全文，修正了一些笔误，润色了一些文字。笔者对上述同志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中东北非有 333 个，占 5%；大洋洲仅占全球的 1%，数量为 39 个（见图 1）。

图 1：2010 年全球智库数量分布



资料来源：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15.

在“智库数量最多的前 25 经济体排名”评比项目中（见表 1），美国智库的数量遥遥领先，位居第一，是屈居第二的中国的 4 倍半；印度名列第三，英、德、法分别位居第四、五、六。阿根廷名列第七。

包括阿根廷在内，拉美共有 4 个国家榜上有名：其中位居第七名的阿根廷有 131 个智库；巴西排名第 13，有智库 81 个；墨西哥第 16，有智库 57 个；玻利维亚第 24，有智库 51 个。从表 1 和拉美国家的情况看，人口多和版图大的国家拥有智库的数量名列前茅。但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间，阿根廷的人口和版图远不如巴西，但智库数量却将巴西远远甩在后面。

表 1：智库数量最多的前 25 个经济体

排名	经济体	智库数量（个）
1	美国	1816
2	中国	425
3	印度	292
4	英国	278
5	德国	191
6	法国	176
7	阿根廷	131
8	俄罗斯	112
9	日本	103
10	加拿大	97
11	意大利	90
12	南非	85
13	巴西	81
14	瑞士	66

15	瑞典	65
16	墨西哥	57
17	西班牙	55
18	罗马尼亚	54
19	以色列	54
20	肯尼亚	53
21	荷兰	53
22	中国台湾	52
23	比利时	52
24	玻利维亚	51
25	乌克兰	47

资料来源：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18.

拉美地区智库总计 690 个（见表 2），其中前 5 个智库最多的国家就包揽了一半以上，达 362 个，他们依次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和智利。智库超过 20 个以上的国家还有 4 个，他们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巴拉圭，即排名前 9 个国家的智库达 494 个，占拉美全部智库数量的 72%。

表 2：拉美国家和地区智库分布

排名	国家和地区	智库数量（个）
1	阿根廷	131
2	巴西	81
3	墨西哥	57
4	玻利维亚	51
5	智利	42
6	哥伦比亚	40
7	哥斯达黎加	33
8	秘鲁	32
9	巴拉圭	27
10	古巴	18
11	厄瓜多尔	18
12	乌拉圭	17
13	委内瑞拉	17
14	多米尼加	15
15	萨尔瓦多	13
16	巴拿马	12
17	危地马拉	11
18	尼加拉瓜	10
1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0
20	洪都拉斯	9
21	巴巴多斯	7
22	牙买加	7
23	波多黎各	5

24	瓜德鲁普	4
25	伯利兹	4
26	圭亚那	3
27	百慕大	3
28	多米尼克	3
29	海地	2
30	苏里南	2
31	巴哈马	1
32	格林纳达	1
33	圣基茨和尼维斯	1
34	圣卢西亚	1
3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总计		690

资料来源：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21.

注：上述拉美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与排比原文如此。

二、拉美智库起源：类型与排名

据拉美学者的考察¹，虽然“智库”（think tank）一词的首次出现和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但实际上，类似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早在 1910 年之前就已在美国出现了。

拉美国家的智库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拉美一些国家，特别是南锥体国家，他们的智库主要是由独裁政府驱逐的一些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创建的。这些学者创建智库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知识分子的保护伞。例如，拉美最著名的“巴西计划分析研究中心”（CEBRAP）就是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卡多佐（Cardoso）建立的。再如，智利的拉美研究公司（CIEPLAN）集中了很多著名知识分子领袖，他们后来在 80 年代末为智利建立联合政府和还政于民的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才开始出现大规模创建智库的浪潮，例如，阿根廷 28 个主要智库中就有 19 个创建于那个年代²。

正如一些研究智库的拉美学者所分析的，拉美地区的智库与其特殊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例如，哥伦比亚和乌拉圭一些智库的诞生源自于个人或政党的需要；还有的智库与政治体制转型密切相关。例如，在智利，有的智库起初为其右翼服务，后来又为中左翼服务；有的智库在融资方面有其明显的特色。例如，秘鲁的智库融资渠道既有内部融资渠道，也有外部的；有的国家的智库明显体现了政权体制的基本特点。例如，阿根廷的分散化政治体制导致其智库也具有类似特点；还有的智库在其政党和政治体制更迭中带有不可避免的个性。例如，近年来玻利维亚 NGO 的智库开始崛起，等等。

与欧美相比，拉美国家的智库在如下一些方面存在自己的特点，或说存在较大差距：智库与政府的互动、智库对立法的影响力、智库与政党的关系、智库对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外交政策等）的影响力、智库影响力的测度、媒体对智库的评价体系的作用、智库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智库的竞争力、知识与智库的转换，等等。

秘鲁一位研究智库的著名学者恩里克先生在其专著《思考政治：拉美的智库与政党》中

¹ Adolfo Garce and Gerardo Una edited, *Think Tank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Fundacion Siena and CIPPEC,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010, p.107-108.

² Adolfo Garce and Gerardo Una edited, *Think Tank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Fundacion Siena and CIPPEC,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010, p.49, pp.107-108.

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以试图解释拉美智库落后于欧美的内在因素³：在达喀尔举行的一次“全球发展网络”研讨会上，一个阿根廷与会者用英文发言，在“公共政策发展”这个议题的讨论阶段，当说到“决策者”这个概念时，他使用了 politician（政治家）这个词。坐在旁边的一个印度学者纠正他说，他指代的实际上是 policymaker（决策者），不是 politician（政治家）。但这个阿根廷人看着他，感到迷茫，重复地向他解释说，他讲的这个人确实就是一个 politician（政治家）。“是 policymaker”，这个印度学者再次纠正他。但这位阿根廷学者还是说，“哦，是一回事。”该书作者恩里克先生接着分析道：“这场交流不仅意味着语言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西班牙语里很难分清职业政治家和决策者；还意味着，在拉丁美洲，技术领域和政治领域并存，但如果将学术与政治这两个不同圈子的概念加以界定，那就很难了。”接着这位学者对拉美智库不发达的情况做了进一步分析，并与欧美做了比较。

在拉美国家和地区中，如表 2 所示，阿根廷拥有智库 131 个，就数量而言位居拉美第一，占 35 个国家和地区智库数量总和的 19%。但是，在《2010 年全球思想库排名》的“拉美智库 25 强”中（见表 3），阿根廷却屈居第四。排名位居第一的是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FGV），第二的是智利的公共研究中心（CEP），排名第三位的还是巴西的智库，即巴西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BRI）。

进入 25 强的智库属巴西最多，为 6 个，占巴西智库数量的 7.4%。智利和阿根廷各有 5 个进入 25 强，分别占其各自智库数量的 11.9%和 3.8%。乌拉圭进入 25 强的智库有 3 个，占其智库数量的 17.6%。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各有 2 个，分别占其各自智库数量的 5.0%，6.3%和 11.1%。从这些数据看，就本国智库进入前 25 强的数量比重而言，阿根廷的比重是最小的。

表 3：拉美智库 25 强

排名	智库名称	缩写	国家
1	瓦加斯基金会	FGV	巴西
2	公共研究中心	CEP	智利
3	巴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CEBRI	巴西
4	阿根廷平等和增长公共政策中心	CIPPEC	阿根廷
5	卡多佐研究所	-	巴西
6	发展研究基金会	-	哥伦比亚
7	国家与社会研究中心	CEDES	阿根廷
8	拉美经委会	ECLAC	智利
9	自由与发展研究所	-	智利
10	应用经济研究所	IPEA	巴西
11	拉美经济研究基金会	-	阿根廷
12	国际关系研究会	CARI	巴西
13	社会与现实经济研究中心	CERES	乌拉圭
14	巴西计划分析研究中心	CEBRAP	巴西
15	民主与自由研究所	ILD	秘鲁
16	经济思想传播中心	CEDICE	委内瑞拉
17	拉美研究公司	CIEPLAN	智利
18	社会与经济现实研究所	CERES	乌拉圭

³ Enrique Mendizabal, Kristen Sample co-edited, *Thinking Politics: Think Tank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IIDEA) 2009;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 2009, p.9.

19	拉美人文经济研究所	CLAEH	乌拉圭
20	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	CLACSO	阿根廷
21	自由基金会	-	阿根廷
22	和平思想基金会	-	哥伦比亚
23	拉美社会科学院	FLACSO	哥斯达黎加, 智利, 厄瓜多尔
24	发展分析集团	GRADE	秘鲁
25	厄瓜多尔政治经济研究所	IEEP	厄瓜多尔

资料来源: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29.

注: 第 23 位的“拉美社会科学院”的三个国家排名情况, 原文如此。

三、拉美智库参与政府决策: 过程与贡献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实行改革以来, 拉美国家的智库发挥了较大作用⁴。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秘鲁总统藤森 (Alberto Fujimori) 刚上台时, 秘鲁的民主与自由研究所 (ILD) 对其内政外交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对藤森治下的秘鲁做出过很大贡献, 它的一项政策建议曾直接创造了 50 万个就业岗位。再例如, 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 (A. José R. Pinochet Ugarte) 由于接受了若干智库的政策建议, 他本人才得以在总统位置上多待了 8 年之久。再例如, 智利首位民选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 (Patricio Aylwin Azócar), 之所以能在 1990 年顺利当选,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接受了智库的政策建议。

拉美国家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发现问题和介入公共议程; 二是政策设计; 三是进行决策; 四是执行政策; 五是对公共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估与监测。据统计, 在经济政策的咨询、制定和执行方面, 拉美国家参与的智库多达 20 个。在社会政策方面, 拉美国家智库参与的数量、深度和广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拉美智库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减困行动。例如, 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三国的减困行动中, 这些国家的智库除第一阶段没有参与之外, 其他四个阶段几乎全程参加, 共涉及智库 16 个, 其中墨西哥有 5 个, 阿根廷 7 个, 智利 4 个; 全程跟踪参与的智库专家为 7 人, 其中墨西哥有 2 人, 阿根廷 3 人, 智利 2 人。在减困行动中, 拉美国家首创的“有条件现金转移”(CCTs) 计划是一个典型案例, 目前已为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所效法, 被誉为是对世界减困行动的一个贡献。

拉美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居全球之首, 1990 年曾高达 48.3%⁵。众所周知, 拉美各国实行的社保制度是典型的“俾斯麦模式”。充分发挥社保制度对贫困发生率的抑制作用是各国政府共同的努力方向。但在发达国家, 由于他们实行的社保制度大多为“贝弗里奇模式”, 所以, 他们采取的减困措施多为“无条件”救助方式, 其本质带有明显的“国家分红性质”。这种普享式的最低收入维持方式无疑将为财政带来较大负担。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于拉美的“有条件现金转移”(CCTs) 则是对“无条件”救助方式的一个替代性方案, 它通过与受助人签订“共同责任书”的方式, 既可相对减少财政负担, 又可提高受助人的激励性, 还可提高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和教育培训效果。在“有条件现金转移”的政策设计和执行中, 墨西哥的“机遇计划”, 阿根廷的“家庭失业主妇与失业丈夫计划”和智利的“团结计划”是智库大规模参与和卷入社会政策全过程的三个重要例证:

——墨西哥的“机遇计划”(Oportunidades) 由社会发展部负责, 是目前墨西哥反贫困

⁴ 除有注释以外, 以下这一小节的资料数据均引自 Adolfo Garce and Gerardo Una edited, *Think Tank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Fundacion Siena and CIPPEC,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010, p.49, pp.115-116,133-160.

⁵ ECLAC,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7*, Santiago, Chile, UN, May 2008, p.52.

的主要手段和措施，每年预算支出已超过 30 亿美元。该计划的覆盖范围从农村开始起步，到 2002 年扩大到城镇，在全国 25 万个基层单位里已经覆盖了 8.6 万个，覆盖家庭已超过 500 万个，相当于 2500 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阿根廷的“家庭失业主妇与失业丈夫计划”（PlyJHD）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社会保障署支持，目前已有近 300 万个家庭受益，受益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是阿根廷最重要的社会计划；

——智利的“团结计划”（Chile Solidario）由计划与合作部负责，团结和社会投资基金（FOSIS）具体执行，覆盖 29 万个家庭和 100 万人口，约占总人口 10%以上，预算已超过 700 万智利比索，约占 GDP 的 2%左右。

在拉美，智利被视为智库普遍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个典范，其“团结计划”的政策设计和执行效果广受称赞。其中，一个广为称道的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案例是，2007 年巴切莱特总统召集了 48 个不同智库的专家，与其他相关人士一起，共同组建了“总统公平与劳动咨询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拉美研究公司（CIEPLAN）的总裁。该咨询委员会的宗旨是就社会问题向总统提出政策建议。墨西哥的特点是，智库在监测和评估的阶段做得比较好，2004 年建立了“社会发展政策全国评估委员会”（CONEVAL），其战略目标是通过监测和评估，对全国所有社会发展政策账户的效率和效果进行评估。阿根廷的特点是，智库参与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工作比较多。墨西哥和智利的决策层与知识界的互动比阿根廷更明显一些，专家的流动性也好一些，智库专家离政策面也更近一些，而阿根廷的智库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更为间接一些，影响也小一些。

四、美国智库的巨大影响力：对拉美政策和对本土政策

由于门罗主义和地缘政治等原因，拉美历来被美国视为其“后院”，于是，在外国语的学习中，学习西班牙语的人数最多；在全球研究拉美的智库中，美国研究拉美的智库数量最多，研究的领域最广泛，力量最雄厚，发表的研究报告在数量和质量上位居全球之首，任何国家难以望其项背。总部位于宾州匹兹堡大学的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SA）就是一个例证，其注册个人会员和机构会员达 6000 多人（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个人与机构占 45%）⁶，分会多达 31 个；自 1968 年召开第一届年会以来，每 1 年半召开一次规模盛大且影响深远的年会，截至 2010 年已召开 29 届。参加 2009 年第 28 届年会的人数达 5823 人，其中美国居民（机构）占 42%。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其对拉美外交政策制订过程中，受到美国智库的影响也最大。

在美国，影响较大的拉美研究智库是卡图研究所（CATO）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他们不仅对美国的拉美政策影响很大，而且在历史上曾多次起到某种决定性作用。例如，2005 年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的袭击，古巴和委内瑞拉是最早提出援助的国家，他们主动提出支援美国 100 万美元、1100 个医生、若干移动医院、水处理工厂、罐头食品、取暖油和 26 吨药品等。美国政府最初打算接受这 2 个“眼中钉”国家的援助，但是，传统基金会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最终美国政府采取了传统基金会的政策建议，没有接受古巴和委内瑞拉的任何援助⁷。再例如，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对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和在 90 年代对海地等一些中美洲国家的干预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和非军事行动，都有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影响发挥作用⁸。再例如，美国对古巴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严厉的经济封锁，这与卡图研究所一些研究报告提出的一贯政策主张不无较大关系⁹。

美国智库与美国驻拉美国家大使馆有着广泛的联系，甚至很多智库的项目负责人曾长期

⁶ 见该机构的网站，<http://lasa.international.pitt.edu/>

⁷ Johnson, *Thanks, But No Thanks for Aid From Self-Serving Autocrats*. Heritage, 2005, <http://www.heritage.org/>

⁸ Wilson, *Haiti's Continuing Challenge to US Policy Makers*, Heritage, 1990, <http://www.heritage.org/>

⁹ Cato Handbook on Policy, Cato, 2005, <http://www.cato.org/>

驻拉美国任外交官和大使，这种政要与研究者之间身份不断转换的“旋转门”现象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很大。2006年6月我访问美国时，曾去K街专程拜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美洲项目主任彼得·德谢佐（Peter DeShazo）先生，他在拉美国使馆工作长达28年，曾在多个国家任大使，不但对拉美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由于长期任外交官，在美国务院的渠道也非常畅通，他们的研究报告经常直达政策面，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非常高。

反过来，拉美与美国毗邻，对美国的影响也非常大。拉美各国各个领域的改革动态和一举一动，都会迅速反映到美国各个领域的改革第一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各领域改革进程既有独特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对于一些改革经验，美国智库均“为我所用，不拘一格”，通过其各自的影响力及其他“院外集团”等多种渠道，很快会反映到立法层面，供决策部门参考，有的改革建议坚持多年，多次提交到国会做证词，“险些”成为美国的立法。

我对社会保障情况知道的稍微多一些，接触的国外学者也稍多一些，知道在圈子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智利1980年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改革立法正式通过，并于次年建立了社保制度的一个崭新模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国家予以效法，在其社保制度改革中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智利因素”；十几年前，中国建立社保制度时引进了个人账户，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智利改革的影响；为了深入了解智利的社保制度，中国各种代表团访问智利十分频繁，智利方面应接不暇，最后不得不制作了中文讲解录音。

当时推动智利这场私有化改革的，是智利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何塞·皮涅拉（José Piñera）。何塞·皮涅拉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曾任智利驻联合国大使。何塞·皮涅拉为长兄，有3个弟弟和2个妹妹，其中，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itián Piñera）于2010年当选为智利总统，另外2个弟弟中，一个是智利前央行董事，一个是音乐家。何塞·皮涅拉1993年竞选智利总统失利之后移居美国，1994年在美国著名的右翼智库卡图研究所（CATO）创建了“养老金改革国际中心”，1995年任该研究所社会保障项目的双主席之一。

在何塞·皮涅拉的推动下，以卡图研究所为首的养老金改革派得到了改革派的大力支持，使养老金账户改革的宣传开始逐渐深入人心；经过无数次国会听证会和连续五、六年的不断推动，2001年5月布什总统终于成立了“加强社会保障总统委员会”，并于当年12月提交了一份《总统委员会报告》。这份题为《加强社会保障、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个人福祉》的报告效法智利模式，有限地引入了一个账户，设计了账户规模依次不等的三个改革方案呈送给国会予以审读。这份改革报告后因种种原因搁浅，但它“险些”被国会立法通过的事实使卡图研究所成为养老金账户改革的一面旗帜。2005年3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曾载文称赞皮涅拉为“养老金改革的吹鼓手”。多年来，卡图研究所为推动社保体制改革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养老金账户改革工作论文系列，系统地发表了大量著述，为“总统委员会”设计改革方案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美国社保体制改革方案走向国会铺平了道路¹⁰。

上述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却牵动了美国学界甚至世界同行的神经。关于皮涅拉本人和卡图研究所推动改革的影响力，在多年之后我见到美国两位著名社保专家并与她们交流这段历史的时候，她们既有感慨万千的惆怅，又有弹指挥间的洒脱。这两位著名教授都是《总统委员会报告》的撰写者（共由16位成员组成，其中8位来自共和党，8位来自民主党）：一位是“偏右”的奥利维亚教授（Olivia），她是著名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另一位是“偏左”的艾斯戴尔教授（Estelle），她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是名著《防止老龄危机》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当然，这两位著名的女性

¹⁰ President's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 (21, Dec.2001), *Strengthening Social Security and Creating Personal Wealth for All Americans*, President's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

教授又都是皮涅拉的好朋友。在先后与艾斯戴尔（在斯德哥尔摩）和奥利维亚（在悉尼）的席间闲聊中，我深深感到，智利改革及其对美国的震撼、美国智库及其对决策的影响，就此次社保账户改革事件而言，都已统统载入史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美国再次掀起账户改革的浪潮时，1995-2000年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与传播推动、2001-2005年美国社保改革蓝图的制定与推广、大小皮涅拉和小老布什等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和故事，肯定会再次成为美谈和热点，甚至会成为再次改革的起点。那时，历史轮回将还是从他们开始，他们将重新成为历史的起点。

五、拉美智库国际网络的形成：左右轮回与多元共存

多年来，拉美国家一些智库与欧美智库形成了若干国际网络¹¹。由于与美国的传统关系等原因，他们与美国智库网络的联系更多一些。拉美智库与美国智库形成的这些网络基本奠定了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智库布局，政策取向相似和同一流派下的智库之间也基本建立了相对制度化的合作机制，甚至形成一个“市场”。比如，阿根廷的平等和增长公共政策中心（CIPPEC）与传统基金会的联系比较多，而与卡图研究所则没有什么联系，据称，这是因为，阿根廷的平等和增长公共政策中心（CIPPEC）追求的主要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再例如，巴西的“千年研究所”也与传统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总部设在秘鲁、由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著名作家及诗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任理事长的“国际自由基金会”（FIL）是一个重要的横跨欧美的智库国际网络。这个智库网络共由21个拉美、北美、欧洲的智库组成，其中有16个智库来自拉美国家，例如，阿根廷有5个，秘鲁2个，智利2个，巴西2个，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等国各1个；在欧洲的智库中，西班牙有4个、瑞典1个，其余均来自美国，包括卡图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城市研究所等均囊括其中。国际自由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自由、民主和法治，自称是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民粹主义的一个回应¹²，认为新民粹主义的传播是拉美缺少自由民主的执行力的结果，还认为新民粹主义浪潮的获胜是伊比利亚—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大倒退¹³。国际自由基金会在欧洲、北美和拉美的影响较大，尤其是理事长略萨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位早年曾与舅妈的妹妹结婚、离婚后又与表妹结婚并生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婚恋，曾参加竞选秘鲁总统、失败后又马上加入西班牙国籍的令人费解的行为等¹⁴，都大大提高了国际自由基金会的国际知名度。略萨于2011年6月17日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被授予名誉研究员并做了“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¹⁵。

百年来，拉美地区始终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军政府包括在内）的角力场¹⁶；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开始退潮，拉美又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但当历史迈进21世纪，中左派政府在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当政，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新自由

¹¹ 以下资料和引言部分引自如下文献：Adolfo Garce and Gerardo Una edited, *Think Tank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Fundacion Siena and CIPPEC,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010, p.192.

¹² 在国内，研究拉美的学者一般习惯将 populism 译为“民众主义”。

¹³ 以上资料引自国际自由基金会的网站：<http://www.fundacionfil.org>

¹⁴ 陈众议：《关于略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6日，第8版。

¹⁵ 杨雪梅：《略萨：写作也许是一辈子的宿命》，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20日，第12版。

¹⁶ 就笔者的理解，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对立概念是国家主义（statist），后者与本文论述无关。在此之外，还有几个范畴需要说明一下：自由主义一词的对立概念的用法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欧洲，自由主义用来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ve）、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和社会主义（socialism）作对比；而在美国，自由主义通常被用来与保守主义作对比，或说人们常常用自由主义来形容民主党，保守主义为共和党。本文作者使用的是美国的用法。“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广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退让过多，而新自由主义则抱怨保守主义墨守陈规。

主义受到严厉批判。毫无疑问，国际自由基金会这个国际智库网络属于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可是有意思的是，他的总部设在秘鲁这个中左派政府治下的安第斯国家，这个有趣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他们轮回也好，并存也罢；实验场也好，理念使然也罢，拉美地区确实确实是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比如，一方面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住房政策改革等都受到极端保守主义的巨大影响，甚至引领全世界的私有化改革潮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的弟子来到军政府治下的智利，成为智利社保私有化改革的设计师），但另一方面，中左派执政党或民粹主义政府上台之后却基本又与这些改革长期共存，相安无事，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倒退”。再例如，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准确地讲从20世纪40年代的庇隆主义（Peronism）开始，阿根廷占主导地位基本是民粹主义（梅内姆时期等除外），但它在拉美却拥有数量最多的保守主义智库，且与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多元化现象。

六、智库作为产业链的影响力：新自由主义盛行拉美的另类解读

近几十年来，智库作为一个产业链正在崛起，影响越来越大。其中，美国的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就是一个重要案例：阿特拉斯基金会既是全球范围内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库的大本营，也是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得以泛滥的一个意识形态输出通道，同时，还是培训新自由主义思想库的思想库。

阿特拉斯研究基金会上述三个特点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产业链。

首先，之所以说“阿特拉斯基金会”（Atlas）是全球范围内极端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是因为阿特拉斯基金会创始人是哈耶克的学生、极端保守主义传播者安东尼·费雪（Antony Fisher）。费雪是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在战争中其胞弟被德国纳粹所杀，此事使费雪成为极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战后，英国工党获胜之后，工业国有化、中央经济计划因素等“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扩大等，费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就在他感到迷茫无助之时，偶然间他阅读了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世界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他最终成为哈耶克的忠实追随者。他专程到伦敦经济学院找到哈耶克当面请教治国之道，并表示从政的强烈愿望，以拯救英国。但哈耶克则表示反对。哈耶克建议他说，从政的影响只是一时的，而建立一个思想库的影响则是永久的，它比从政更能改变社会，更能改变思想。后来，他实现了这一理想：他利用在美国学到的最先进的流水线式养鸡场的方法，在英国举办了现代化养鸡场；养鸡场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信守对哈耶克的承诺，用这些资金于1955年在伦敦建立了“经济事务研究所”（IEA）；这个研究所以保守主义为其出发点，坚决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将这些思想传播开来，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成为后来“撒切尔革命”的思想基础。费雪由此名声大振，享誉国内外；经济事务所也声名鹊起，在很多人的邀请下参与咨询如何建立智库的事业，随即便帮助他人在美国先后建立起几个智库。1981年，费雪来到美国，在旧金山成立了“阿特拉斯研究基金会”，试图将帮助别人建立智库作为该基金会的主要业务，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自由经济思想库的思想库。对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耶克和撒切尔（Margaret H. Thatcher）这三位保守主义先驱都给予高度赞赏，鼓励他将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的模式在世界各地进行复制。于是，费雪逐渐将阿特拉斯基金会办成一个智库“连锁店”：在美国的几个州、在土耳其、印度、意大利、智利、阿根廷、秘鲁等国都先后开始建立起智库。目前，阿特拉斯基金会在30多个国家建立了400多个市场经济制度的思想库，对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1988年费雪逝世之后，英国保守党议员奥利弗（Oliver）在1994年的《泰晤士报》上载文这样高度评价他：“没有费雪，就没有经济事务研究所；没有

经济事务研究所及其所属机构，就没有撒切尔，甚至很可能就没有里根；没有里根，就没有星球大战；没有星球大战，就没有苏联的经济垮台。所以，这就是一个养鸡场企业家的因果关系链啊！¹⁷”也许奥利弗这个“因果链”的评价有些夸张：费雪 1981 年才登陆美国建立阿特莱斯基基金会，而里根（Ronald W. Reagan）早在这一年的 1 月就已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就费雪与撒切尔革命的关系而言，其作为养鸡场企业家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链”似乎已经得到破解：在我的记忆中，当有人说到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时，撒切尔夫人曾多次断然否认，并坚决否认她本人是弗里德曼的信徒——尽管弗里德曼在撒切尔首相雄踞英国政坛 11 年中始终是她的经济顾问。但是，撒切尔首相却从未否认费雪及其智库（因果链）对她本人的巨大影响，反而对费雪及其创建的这些思想库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说它“拯救了英国”。尽管里根被置于费雪智库这个“因果链”上似有些勉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奉行供给学派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以货币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撒切尔主义如出一辙，在流派渊源上都可追溯到费雪及其创建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智库上。

其次，之所以说阿特莱斯基基金会是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得以泛滥的一个意识形态输出通道，是因为这个产业链对输出新自由主义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与该基金会的领导人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该基金会的 CEO 是一个阿根廷人查富恩（Alejandro Chafuen）。查富恩博士 1985 年进入阿特拉斯，对费雪极为崇拜，不久就成为费雪的忠实追随者，1991 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同时，还是“西班牙美洲经济研究中心”（HACER）的创始人和主席。阿特莱斯基基金会的社会声誉和他本人保守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作为阿根廷人的客观条件，使他逐渐成为自由经济思想在拉美与美国之间跨国流动的一个中枢¹⁸，而由查富恩领导的这几个智库就事实上成为这个中枢的关键行为者。查富恩领导的阿特莱斯基基金会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拉美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是前述“国际自由基金会”（FIL）的理事会成员，与“西班牙美洲经济研究中心”（HACER）一起，这些智库被公认是新自由主义思想“通向”拉美的一个重要管道，是拉美地区在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泛滥的一个主要思想发源地和传播者。查富恩本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腐败等方面，他的研究成果经常被包括卡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在内的美国智库学者所引用，传统基金会常常将这些研究报告直接报送布什总统，对美国援助拉美各国的分配布局曾发挥较大作用。此外，阿特莱斯基基金会作为一个平台，对智利的“公共研究中心”（CEP）等拉美国家智库的研究倾向和研究方法也产生过较大影响，对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客和官员的“亲市场倾向”也产生较大影响。

最后，之所以说阿特莱斯基基金会是自由经济思想培训人才的庞大产业链，是因为阿特莱斯基基金会不仅本身是一个思想库，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生产”思想库的思想库，是一个“智慧生产商”（查富恩语），是一所大学。该基金会每年向世界各国提供智库专业的 MBA 硕士学位（TT-MBA），为拉美国家保守主义智库培养了大批研究人员，很多获得该学位的毕业生来自拉美各国，在拉美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学员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2010 年毕业生中还有一位来自中国，甚至每年有很多学员来自发达国家。在每年的培训中，还有一个培训项目是“全球智库领袖培训班”，每期一周，每次培训班均有上百人参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很多拉美智库领袖都是这个项目的忠实参与者。该基金会的另一项重要功能是为各国建立智库提供技术服务。此外，该基金会每年出版大量学术著作。

如同费雪建立的保守主义智库深深地影响了保守党和撒切尔并导致产生“撒切尔革命”，在撒切尔之后英国向“第三条道路”的转型中，英国的其他很多“中左翼”智库也同样发挥

¹⁷ 见阿特莱斯基基金会网站：<http://atlasnetwork.org/>

¹⁸ 以下资料引自 Adolfo Garce and Gerardo Una edited, *Think Tank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Fundacion Siena and CIPPEC,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010, p.196-197.

了重要作用¹⁹，例如，布莱尔对工党的改革、“新工党”的产生、1997-2007年长达10年布莱尔首相的三次当选连任以及布莱尔主义的形成和“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等等，背后都有智库的影子。上述英国智库的资料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思想库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影响力确实是巨大的，它能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影响世界；它常常决定了著名政治家的诞生、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重要政党的改革走向及其生死存亡，甚至还常常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左右轮回和政权更迭。

很显然，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和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本土和域外一些智库的较大影响；再往前追溯，半个多世纪以来，拉美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和社会政策调整都受到一些思想库的极大影响，例如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拉美国家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中国智库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三个定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硬实力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经济总量去年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硬件设施方面，中国的财政投入及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公路桥梁建设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在“金砖五国”中排名第一，甚至业已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市政建设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很多方面已超过发达国家，令一些到访的外宾游客刮目相看。

但是，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始终存在较大差距。这个“软实力”显然应包括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因素。美国有一个华尔街，中国没用几年很快就建立了北京金融街，因为这是“硬实力”。美国还有世界著名的智库一条街“K街”，但“中国版的K街”却始终无人问津，个中原因，很可能他被认为与GDP比较遥远。美国首都华盛顿的K街世人皆知，那里集中和吸引了全美最著名的思想库，对美国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巨大，人们戏称，不了解K街，就不了解美国政治的本质，为此，K街已成为除了行政、立法、司法和媒体之外的“第五权力中心”。美国K街毗邻国会山和白宫，从这个街头到那个街头，相隔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在地理上拉近了智库与决策之间的距离，而华尔街则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纽约。相比之下，金融街坐落在黄金地段，与天安门近在咫尺，这也可看出，金融离GDP更为接近、甚至就直接被视为GDP的重要性。

几年前开始兴建的北京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目前已升级为“FUN HILL 智汇城”，据说欲打造成“中国智库大本营”，现已入驻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内共有四所大学²⁰。且不说入驻的研究教学机构的数量太少，仅就地理位置而言，据我的博士生说，他们从良乡到我们研究所，单程就需要2个小时以上。

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力度，加强软实力建设，这已形成社会共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轻商重士”的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已被多年来呼吁的走出“轻文重工”误区的各种声音所淹没得无影无踪。

美国《2010年全球思想库排名》显示，中国有智库425个，就数量而言，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拥有1816个智库的美国²¹；但据中国学者的统计²²，目前中国有各类智库2000

¹⁹ Robert Carl Blank, *From Thatcher to the Third Way: Think-Tanks, Intellectuals and the Blair-Project*, Ibdem-Verlag, 2003.

²⁰ 见北京良乡高教园区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univercity.org.cn/index/text.aspx?newid=135>；参见新华网：《良乡打造 FunHill 智汇城 中美专家对话高教园区》，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11-06/02/c_121486269_2.htm

²¹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p.18-19.

²²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有智库2000多个，例如，俞可平：《智库的影响力从何而来》，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年第2期，第63页；再例如，许共城：《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第82页。

个左右，早已超过美国。但无论如何，我们基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智库系统已初具规模。这个智库系统主要可分为四、五类：隶属教育系统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属于各级政府干部培训系统的党校与行政管理学院；属于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序列的社会科学院；隶属于各级政府序列的“发展研究中心”。如果还有第五类的话，那就是类似 2009 年建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和政府各部门下辖的研究机构，再加上为数不多的民间研究机构。我推想，2000 多个智库大概主要就是由这五类构成。但毫无疑问，这些智库在隶属管理体制、财务筹资机制、单位用人制度、研究激励机制、职级科层结构、成果表达与评价机制、会计与税收制度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远不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智库的巨大需求。从这个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在中国还为数不多，智库在中国还依然属于一个新生事物，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形成的软实力还存在很大差距，难以与发达国家的智库系统媲美。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经济特区的建立。在特区中，其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和进出口政策等都是享有特殊优惠条件，从而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经济体制改革。据报道²³，美国智库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私人或企业对智库的捐赠也从应纳税额中扣除。中国要大力发展智库系统，从根本上讲，要从鼓励民间资金的进入开始入手；从目前阶段看，要从整合现有科研力量，改革现有科研管理体制，加大财政投入等方面着手。

早在 2007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²⁴。2011 年 7 月 2 日，李长春同志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努力在破解发展难题、健全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²⁵。

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观需要智库的智力支持，科学发展离不开智库的决策参与，其中，破解发展难题尤需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智库从后台走向前台的时代已经到来。智库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 2009 年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被称之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于当年 7 月 3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²⁶，30 多家全球顶级智库、150 多名各国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中外企业代表共 900 多人齐聚北京；2011 年 6 月 25-26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责任”，来自海内外知名智库及学术界、企业界和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的 500 多名代表与会。李克强副总理两次参加了全球智库峰会，这说明，中央政府日益重视智库的作用。

中国智库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正为发展“智库业”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时机。虽然中国智库发展起步既晚于欧美，又落后于拉美，但我们既可吸取欧美的良好经验，又可借鉴拉美的有益探索，以尽快赶上拉美和欧美智库的发展水平。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加强智库专业化建设，充分运用构建智库市场化运行机制的优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网络体系建设。

早在 2007 年，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战略定位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三个定位”的要求，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哲学社会

²³ 《欧美“智库”影响力从何而来 我国智库发展瓶颈何》，载《北京日报》，见网站：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22/content_13221550.htm

²⁴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6429094.html>

²⁵ <http://cpc.people.com.cn/90nian/GB/224164/15081433.html>

²⁶ <http://www.cciee.org.cn/>

科学的最高殿堂²⁷。在这“三个定位”中，“坚强阵地”实际是指世界观方法论，是指中国学派、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兴盛之道和必由之路，是与国外智库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利益争斗、左右倾轧和流派繁杂的本质区别之所在；“思想库和智囊团”是指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好、为人民事业服务好的重要和天职；“最高殿堂”显然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性和崇高性，是指传承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立院之本，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最高荣誉。其中，“坚强阵地”是“思想库智囊团”和“最高殿堂”的工作指针；“思想库和智囊团”是“坚强阵地”的必然要求和“最高殿堂”的表现形式；“最高殿堂”是“坚强阵地”的载体与“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基础。三个定位，三位一体，他们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不可替代性和客观性之所在。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的“三大强院措施”（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既是贯彻落实“三个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现行中国智库管理体制（指“管理强院”的具体措施）的有益探索。这个探索正日益显示出积极效果。

李长春同志 2011 年初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进一步指出²⁸：“中国社会科学院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正确办院方针，积极履行中央赋予的三项主要职能，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发挥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央领导同志之所以赋予中国社会科学院三项主要职能，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具有一定地不可替代性和相当地客观性，她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表现在规模上。例如，在美国 1816 个智库中，华盛顿特区大约有 350 个，其中坐落在 K 街的约不到一半，且大多数智库也就是十几个人的规模，据此推算，研究人员大约不到 4000 人。这个规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的规模大体相当（如果算上退休的科研人员则要大大超过）；其次，从智库的研究类型看，美国的智库有政策研究型、政党代言型、政府代理型、学术型、行动型等五类，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毫无疑问兼具这五个类型的全部特征，且在人文研究方面要远远超出美国智库这五个类型的涵盖范围；再其次，从智库的研究领域看，美国华盛顿 K 街的智库分属不同专业领域，从外交到内政，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从宏观的发展战略到中观的城市规划，从健康政策到减困政策，等等，可谓无所不包，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领域跨度完全可以将其全部覆盖。

表 4：美国 9 个智库雇员数量与预算（美元）

智库	雇员数量	年度预算
兰德公司（RAND）	640 名专职研究员，460 名兼职研究员	1.69 亿美元
传统基金会（HF）	45 名专职研究员，43 名兼职研究员，5 名访问研究员	3348.1 万美元
布鲁金斯研究所（BI）	98 名专职研究员，173 名兼职研究员，48 访问研究员	3022.8 万美元
对外关系委员会（CFR）	65 名专职研究员，100 名兼职研究员，20 名访问研究员	2572.0 万美元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	140 名研究员	2079.9 万美元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126 名专职研究员，54 名兼职研究员	1689.6 万美元
卡图研究所	37 名专职研究员，31 名兼职研究员	1404.5 万美元

资料来源：James McGann, *Responding to 9/11: Are Think Tank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July 31, 2003, p.11.

²⁷ 王伟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1 年度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11 年 3 月 24 日，第 2 版。

²⁸ 王伟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专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继续实施三大强院战略 全力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11 年 7 月 26 日，第 2-3 版。

因此，仅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总体规模和研究范围而言，它大体可与被称之为美国“影子政府”和“政府大脑”的华盛顿 K 街相媲美。如果再从地理位置上看，建国门的社科院和复兴门的金融街，他们一左一右，一软一硬，构成了“中国版 K 街”和“中国版华尔街”的客观存在。当然，如表 4 所示，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非常充足，例如，雇员总数 1100 人的美国兰德公司年度预算为 1.69 亿美元，而中国的智库的经费预算相比之下则少得很，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放工资的名单多达 7000 多人（含 3000 人退休人员），但经费预算仅为 1 亿美元多一点而已。

实际上，根据《2010 年全球思想库排名》²⁹，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些评比项目中不仅榜上有名，而且有的还名列前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智库地位已有相当的国际知名度，尤其经过这几年实施“三大强院措施”的“打拼”，国际声誉逐年提高，排名逐渐靠前；有理由相信，一旦“创新工程”开始实施并显现出实际应有的效果，“建国门”在全球智库排名中就会更为名至实归。在《2010 年全球思想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项排名如下：

——在“全球智库 50 强（不含美国）”的评比项目中，中国（大陆，下同）有 3 个智库榜上有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排名第 15 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CICIR）排名第 38 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IIS）排名第 49 位；

——在“全球智库 25 强（含美国）”的评比项目中，中国只有一个智库囊括其中，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 24 位；

——在“亚洲智库 25 强”评比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一，另外 2 个榜上有名的中国智库分别是排名第 5 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排名第 7 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SIIS）；

——在“全球政府官方智库 20 强”评比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四，紧随世界银行研究院（WBI）、美国国会研究处（CRS）和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安全研究所（RUSIDSS）之后。还有三个中国智库列入其中，他们是排名第 10 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 11 位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15 位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在“全球国际经济政策智库 25 强”项目中，中国只有一个智库囊括其中，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CASS），位居第 14 名，在兰德公司（第 10 位）之后。

只要稍微往前追溯几年，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排名是非常稳定且稳中有升：

——在《2007 年全球思想库排名》中³⁰，设定的评比项目很少，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只有 2 个项目；在“全球智库 10 强”中，中国只有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位列其中（按字母排序）；在“全球智库 30 强”中，中国有 2 个榜上有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按字母排序）。

——在《2008 年全球思想库排名》中³¹，设定的评比项目开始有所增加，其中，在“全球智库 10 强”中，中国智库全军覆没，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也消失了；在“全球智库 50 强”中，中国智库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挤入名单，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 25 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34 位；在“亚洲智库 25 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 1，还有 5 个智库榜上有名，他们依次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6 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 9 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第 13 名）、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Cathay，第 15 名）、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第 22 名）；在包括“全球国际经济政策智库 25 强”

²⁹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p.25-27, p.33, 38, pp.46-47.

³⁰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0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p.25-27, p.16-17.

³¹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0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p.27-35.

在内的所有其他排名评比项目中，中国智库均榜上无名。

——在《2009年全球思想库排名》中³²，“全球智库50强（不含美国）”的评比项目只有2个中国智库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15，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4；在“全球智库25强（含美国）”项目中，中国没有智库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榜上无名；在“亚洲智库40强”评比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2，另有3个入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8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第14）、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第24）。

上述4年来的评比结果显示，在2010年评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球智库50强（不含美国）”中连续2年排名第15位；在2010年“全球智库25强（含美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入选并跃至第24位；在亚洲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3年来的排名情况是第1、第2和第1；在2010年首次设立“全球政府官方智库20强”评比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跃为第4；在2010年首次设立“全球国际经济政策智库25强”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便立即入选。相比之下，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外，中国的其他智库排名稳定性较差，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各项评比排名中基本是稳定的，且稳中有升。

当然，美国宾州大学的这个排名评比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它仅是一家之言，甚至它们根本不应进入我们的评价体系，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可看出中国智库在世界智库整体排名中的基本位置，同时也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本实力和国际知名度。

八、拉美所50年：继往开来，迎接挑战

拉丁美洲研究所（下简称“拉美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所之一。

50年前的7月4日，在毛泽东主席重要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拉美所正式成立。50年来，拉美所的发展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与中国拉美关系的“累积-跨越式”发展一脉相承³³。50年来，尤其近年来，拉美研究方法论的逐渐学科化，学科建设的逐渐范例化，案例研究的逐渐典型化，基础研究的逐渐层次化，动态跟踪的逐渐对策化，研究选题的逐渐自主化等，已成为拉美所不断发展的一个趋势，正逐渐与国外拉美研究机构相衔接。由于拉美研究的需求不断扩大，近五十年来，拉美所作为“中国唯一”拉美研究机构的状况开始出现变化：前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建了拉美研究所，去年西南科技大学创建了拉美研究院，今年浙江外国语学院创建了拉美研究所。三年增加了三个拉美研究机构，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尽管离党和人民的要求、离社科院的要求、甚至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拉美所迎接时代挑战、保持“中国第一”拉美研究的智库地位的信心没变。

50年来，尤其近些年来，除上述研究工作之外，拉美所作为一个思想库，在公共外交方面日益显示出其独特作用。思想库与公共外交作为两个专业词汇，最早都诞生于美国。据研究，公共外交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是1965年由美国塔弗兹大学一位教授首次提出的³⁴，是指那些“在外交政策形成和执行问题上影响公众态度”的做法，具体可体现在推行“二轨”外交等几个方面。“二轨”外交是1982年美国一外交官提出的一个概念，后被广泛使用。拉美所一方面与拉美地区十几个驻华外交使团建立了广泛和友好的联系机制，甚至成为朋友，另一方面与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和中联部拉美局也建立了相对固定和长期的联系机制，甚至与拉美局还建立了年终联系机制。在这个框架下，拉美所一方面多次承担了中国方面这两个部门下达的有关学术活动和研究项目，还主动设计并走出国门参与组织了类似“金砖四国”学术峰会等相关大型多边活动，在公共外交或“二轨”外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有关部门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为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事工作做出了一些努力；另一方面，拉

³²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0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p.30-41.

³³ 关于中国与拉美关系的“累积-跨越式”发展的论述，见郑秉文、孙洪波、岳云霞：《中国与拉美关系60年：总结与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2009年增刊2（双月刊），第3-17页。

³⁴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功能》，载《红旗文稿》，2011年第1期，第33页。

美所还几乎每年都举办若干由拉美驻华使团出面协调或联合举办的带有“二轨”外交色彩的学术活动。公共外交与学术研究的相互促进，为拉美所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50年来，无论在人员规模上，还是在学科布局上，拉美所始终位居“中国第一”；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所的职工总数曾一度超过120人，即使目前也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拉美研究机构。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不包括协会或学会，仅就研究实体来讲，剔除拉美地区本土的智库，再剔除位于智利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和位于华盛顿的美洲开发银行（IDB），在雇佣全职职员的数量方面，拉美所的排名应该在前10位以内；比拉美所规模稍大一些的研究实体有美国的美洲对话组织（IAD）、伊利诺伊大学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CLACS）、俄罗斯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ИЛИА РАН）等，德国和西班牙等几个欧洲国家的拉美研究机构的规模稍比拉美所大一些。

50年来，中国的拉美研究从无到有，拉美所的研究从小到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拉动中拉经贸关系突飞猛进，拉美的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拉双方高层领导密集互访；中拉关系的“累积-跨越式”发展为拉美研究带来了空前的生机。目前，作为中国拉美研究的重镇，拉美所每年初召开的拉美形势论坛云集几百人，从2005年3月开始至今已连续召开了七届，日益成为学术界与政策面、科研与外交、拉美所与拉美驻华使团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成为中国拉美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研讨会和信息发布会，其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的国内外学术资源也越来越多样化，甚至为拉美所发展和拉美所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于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拉美研究方法论的逐渐学科化、学科建设的逐渐范例化、案例研究的逐渐典型化、基础研究的逐渐层次化、动态跟踪的逐渐对策化、研究选题的逐渐自主化，正悄悄发生在每一天。

就在这个时刻，拉美所迎来了建所50周年。

在拉美所纪念成立50周年之际，领导同志十分重视拉美所的工作，为拉美所赠送题词或贺词。在领导同志赠送的题词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的题词是：“研究拉美更知世界多样，振兴中华岂能亦步亦趋”；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同志的题词是：“五十年硕果累累，新时期再创辉煌”。

在赠送贺词的领导同志中，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拉美友好协会会长成思危同志赠送的贺词是：“半个世纪的艰辛创业，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中国拉美研究事业不断发展。未来中拉关系前程似锦，中国拉美研究任重道远。希望拉美所再接再厉，当好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和智囊团，为中国的拉美研究事业再创辉煌，为促进中拉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领导同志为拉美所50年所庆赠送题词和贺词，这是对中国拉美研究的高度重视的具体体现，是对拉美所几代学者同仁的极大鼓励，也是对建立中国拉美研究智库网络的有力推动。拉美所全体同志对领导同志的鼓励表示衷心感谢。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兼任院长陈奎元同志在2011年3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当前科研工作的任务和实施创新工程的意见》中指出³⁵，“实施创新工程的根本要求是更加有利于发挥研究团队的整体功能，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为人才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现在大环境不存在问题，需要我们营造、优化、强化自己的小环境、小气候。”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在其做的《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年度报告中指出³⁶，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全面打造党和国家的重要思想库”，“抢占理论学术制高点”。

³⁵ 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当前科研工作的任务和实施创新工程的意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31日，第1版。

³⁶ 王伟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11年3月24日，第2版。

客观地讲，与其他所有公立研究机构一样，拉美所在科研体制机制等很多方面还很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离院党组的要求和社会的评价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她的产出质量与数量与国际上小于拉美所的研究机构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在中央“三个定位”的指导上和“三大强院措施”的实施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积极制订的创新工程的全面展开，借着建所 50 周年的东风和领导同志题词的契机，拉美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乘势而上，迎接挑战，必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在即将结束这个“代序”之前，我再讲几句编撰这本《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的一些初衷和想法。

作为中国唯一的拉美问题综合研究的重要智库，拉美所向中国同行们献上这本《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既是为拉美所建所 50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为推动国内智库网络发展和提升中国拉美研究学术水平应尽的一份义务，同时，还可成为相关政府决策部门案头的一部拉美研究的工具书。

在拉美所建所 50 周年之际，在本书付梓之前，作为拉美所所长，我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以“代序”的形式对全球智库的基本情况和拉美智库的一些“故事”做一点介绍和分析，阐发自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工作 28 年的体会以及对她和中国智库现状与前景的一些“解读”，一是为了增加这本工具书的可读性，二是为了更多地介绍和传播一些拉美及其智库的相关知识，三是强调拉美研究和智库工作在中国的重要性，以期引起相关决策部门对拉美研究的高度重视，最后，也是“逼着”自己多读一点拉美的一个做法。

在编写该书过程中，所内外众多作者都付出了辛苦，做出了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委员、拉美所前所长苏振兴研究员为该书撰写了三个范例，确定了目录和体例；《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包揽了所有稿件的责编工作，主任蔡同昌同志负责众多作者的协调组织工作和统稿工作，张颖同志在前期曾负责过作者的协调组织工作。

虽然本书初稿曾打印成册分别征求意见，但肯定存在挂一漏万之处，尤其是，由于资料和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重要的智库还没有尽收囊中，实在遗憾，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 郑秉文
2011 年 7 月 4 日初稿，7 月 29 日定稿于北戴河

主要参考文献：

陈众议：《关于略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1 月 16 日，第 8 版。

许共城：《欧美智库比较及对中国智库发展的启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双月刊），2010 年第 2 期，第 82 页。

杨雪梅：《略萨：写作也许是一辈子的宿命》，载《人民日报》，2011 年 6 月 20 日，第 12 版。

俞可平：《智库的影响力从何而来》，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月刊），2010 年第 2 期，第 63 页。

黄江松：《欧美“智库”影响力从何而来 我国智库发展瓶颈何在》，载《北京日报》，见网站：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22/content_13221550.htm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功能》，载《红旗文稿》杂志（月刊），2011 年第 1 期，第 33 页。

郑秉文、孙洪波、岳云霞：《中国与拉美关系 60 年：总结与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双月刊），2009 年增刊 2，第 3-17 页。

Adolfo Garce and Gerardo Una edited, *Think Tank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Fundacion Siena and CIPPEC,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010.

Cato Handbook on Policy, Cato, 2005, <http://www.cato.org/>

ECLAC,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7*, Santiago, Chile, UN, May 2008.

Enrique Mendizabal, Kristen Sample co-edited, *Thinking Politics: Think Tank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IIDEA) 2009;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 2009.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0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0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0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James McGann, *Responding to 9/11: Are Think Tank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July 31, 2003.

Johnson, *Thanks, But No Thanks for Aid From Self-Serving Autocrats*. Heritage, 2005, <http://www.heritage.org/>

President's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 (21, Dec.2001), *Strengthening Social Security and Creating Personal Wealth for All Americans*, President's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

Wilson, *Haiti's Continuing Challenge to US Policy Makers*, Heritage, 1990, <http://www.heritage.org/>